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讲演会

时间：2010年12月27日

地点：近代历史所

日本的中国研究于国际文化论

平野健一郎

接下来，我将就日本的中国研究与“国际文化论”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传统，而“国际文化论”则属于一个较新的领域。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基础系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国际文化论”，直至80年代。综合自己学术成果的著述《国际文化论》于2000年出版。

进入90年代，日本的一些大学及研究生院新开始设立“国际文化研究专业”，“日本国际文化学会”（Japan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2001年成立，我出任了首任会长。

我的“国际文化论”具有独到之处。受到了中国研究的极大影响是我的“国际文化论”的特点之一。从另一角度看，“国际文化论”也对在中国研究领域发挥了作用。基于这一观点，张启雄先生此前曾对我的“国际文化论”的意义予以认可。

平野的研究经历

入门：

我于50年前升入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主修国际关系论，并兼修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史、国际法、国际经济学等课程。升入研究生院后，在已故的卫藤沈吉教授的指导下主攻“远东国际政治史”，并开始研究“满洲事变”及“满洲国”。

在较早时期便为着手广义的“中国研究”而赴美留学，这构成了我的特点之一。如果没有此次的留学经历，我将不可能成为研究者。我对卫藤先生的指导怀有感谢之心。

我决定即使前去美国留学，也将不中断“满洲事变”和“满洲国”的研究。虽然卫藤先生曾劝我开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但我并不喜欢经济学。

美国留学：

1963年至1967年留学哈佛大学，用了两年完成了硕士课程“地域研究——东亚”，再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历史学系博士课程“东亚文明”。导师为费正清，博士论文导师为本杰明·施瓦茨与**阿尔伯特·克雷格**。

硕士课程“地域研究——东亚”的英文名为“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并不属于“地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与战后的美国“地域研究”战略的性质不同。当时，费正清、赖肖尔等美国年轻一代研究者为彻底了解亚洲，尤其是中

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越南、蒙古等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被要求必须掌握两门以上的亚洲语言。

哈佛从事亚洲研究的教员、研究生是一群智能最为优秀、求知欲旺盛、异于常人的好奇心及感觉极为敏锐的学者。费正清便是其中之一（其后，平野将费正清的自传《*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翻译为日文）。

平野美国留学的历史、社会意义——美苏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主的自由主义阵营开展了对敌研究人员的培养。来自台湾（地区）、韩国等的留学生也有参加这一课程者。

费正清先生的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将推进国际性学术研究的组织化、中国研究的实验，培养推进与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合作的重点人才，奠定国际学术交流的框架。

我在参加“富尔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面试时被问道：“希望去台湾留学吗？”当时，在推崇“新中国”的氛围中，有志于中国研究的日本年轻人中没有谁会希望去台湾。虽然自己在东大交往的中国留学生全部来自台湾，但自己还是认为“不能去台湾。（大陆）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一定要研究它”。

平野自升入研究生院后便开始学习中文，即使在哈佛期间也不曾间断过。一年级的阅读成绩为A。但是，在二年级的会话课上，受到了在台湾接受过语言学训练的美国学生的压制，没有讲中文的机会。于是，自己成了不能讲中文的“中国研究者”。

师从费正清先生

我认为与费正清先生的相遇，决定了自己的研究道路、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研究生时代，当我对费正清先生说“某某先生的弟子”时，他纠正说：“健一郎，在研究领域里，我们都是学生呀。”学界的全球泰斗的这番话决定了我的研究态度。

2. 他一直强调：讲述历史时，不应使用统称，而应使用固有名词。譬如，不应说“清朝政府”，而应说“清朝的某人”，应以“中国的某地”代替“中国”等。他教导说：“阐述历史应该具体且准确。”于是，自己便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如何把握推动历史的‘主题’”这一问题。

3. 他强调“必须规避抽象名词”。譬如，必须尽量避免使用诸如“modernity”、“modernization”之类的抽象名词，而代之以“modern”之类的形容词。尽量不使用“日本的近代化”，而应该认为是日本社会也“步入了近代”。不应视“近代化”为以西方为主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会随历史前进而出现变化，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modern”。

费正清的思想对中国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他主张将中国史视为独立的历史，并基于这一观点彻底了解中国。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费正清虽然被人批评为“不从中国内在因素审视中国史”，但他的思想却与这一批评完全相反，从很早以前便强调“应该从中国内在因素的角度审视中国”。

从我个人来讲，费正清的有关中国史的观点构成了我的国际文化论的基本框架。于是，我开始思考，既然历史变化的主体并非只有一个，那么，构成中国史

的主体难道不也是不只“中国”的吗？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

从时间段来看，可以1972年为节点分为两个时期。1972年以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开始能够访问大陆。其后，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参与全球的中国研究。

截至1972年的战后日本中国研究始于1952年，1962年发生了**亚洲福特基金会事件**，1967年至1968年直接受到了**越南战争**的影响，1972年，随着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出现了重大变化。1972年至今，中国研究主要以日美中三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开展起来。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这一势头更加强劲。可以说，天安门事件、中国的人权问题等也未对中国研究形成较大的障碍。

在日本，真正学术性质的中国研究可以说是重启于1952年。是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缔结。由于2年前的朝鲜战争，冷战在亚洲化为热战，美中对立局面形成。1952年，费正清实现了战后的首度访日。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编写完成了中国研究的文献目录。坂野正高先生成为了他的合作者。费正清、坂野、山本编写的《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于195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3年后，费正清、蒲池编写的《中国研究》编目出版。

费正清已经开始在哈佛着手中国研究，并正式创立与中国相关的教育体制。1948年，他出版了《*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为推动美国人了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据此推测，他为了有效利用战前的日本中国研究成果，于1952年日本逗留期间完成了文献目录，同时，对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对日美两国学术交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1954年，东洋文库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援助，设立了“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市古宙三先生长期主持该委员会，从收集整理近代中国研究所需的文献到确定研究体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亚洲福特基金会问题

1960年的反对《新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仅在日本的大学生、研究生及知识分子中留下了高涨和空虚的结果而结束。被视为这一斗争的余波也同时为日本的中国研究带来了影响。这便是被称为“亚洲福特基金会事件”。1962年，美国两大财团在中国研究方面选择了东洋文库，在东南亚研究方面选择了京都大学，并决定为之提供资助。于是，以东京、京都两地的项目助手、大学研究生为中心，掀起了反对接受美方资助的运动。

资助被视为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一环，但这并未演变成大型的反美运动。反对运动仅限于学者范围，就连年轻学者与年长学者之间也表现出了一些代沟层面的对立。可以说，最终是以追求改善研究条件动向——这里表现出与研究的国际主义相通的倾向——及追求研究的国际主义动向之间出现分裂而告终的。

我是在1963年至1967年间留学哈佛的。1960年，我既参加了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活动，也进行了毕业论文的撰写。1962年至1963年，我还参加了反对亚洲福特基金会运动，摸索了进入研究领域之路，并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当时，

自己只希望能够在研究工作方面实现自立，而完全出乎预料的是，自己成为了具有自我特点的学者。

我留学美国期间，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鼎盛时期。基于从外围研究中国的需要，出现了许多解释性观点。近代化论（几乎等同于欧化论）便是其中的代表观点。费正清对近代化论持批判态度。费正清虽曾批评其采用了“冲击与回应”论，但他与**邓嗣禹**合作的研究成果《*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则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集。

当时，日本的《中国观察家》所获的有关中国大陆内部现状调查资料中，就连香港的部分也来自美国。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美国希望沿袭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成果，他们高度评价了实证研究。中国研究专家也将日语视为了必修课。

譬如，费正清对东亚研究所的《支那以民族统治研究》系列文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参考这一研究框架，并模仿印度的“*diarchy*”，将中国王朝的统治体制称为“*synarchy*”（满汉共治）

这表明，对当时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倾向于思想史略持批判态度的费正清希望自己能够主导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今日可以从中推断，关于中国社会和国家统治这一自古以来的大难题，费正清极有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本性质与以民族统治相似。

○我对满洲事变、满洲国建国研究

为向哈佛提交博士论文，我开展了有关满洲事变、满洲国建国的前史研究。费正清先生给予了我鼓励与指导。我的第一稿为单一的通史性质的架构。费正清先生建议我改为从行政、货币政策、教育制度等各个侧面和问题搭建架构。修改后，（论文）具有了制度史研究的性质。

此外，关东军的满洲国建国构想则以橘朴的中国社会研究和支那异族统治论为基础。从虚无主义角度分析统治中国这一自古以来极为复杂、复合型庞大社会的国家的性质，我认为满洲国将会成为傀儡国家。

但是，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的实施及满洲国的建国构想均基于关东军的资料，且不得不放弃军事及政治史方面的考察计划。绪方贞子的博士论文采用的同一资料，发表了题为“*Defiance in Manchuria*”的论文。本杰明·施瓦茨则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希望阐释日本人为何要发动满洲事变和建立满洲国，发表了题为“*In Search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的论文。

读了这些论文，我受到了电击般的冲击。本杰明·施瓦茨将庞大且满是谜团的中国解释为一种复合文明，一种多文化的组合体。同时，他对中国是基于哪些必要性和适应性进行选择或拒绝、抵抗，并以其主体性使之发生变化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完美例证。

我意识到，日俄战争至满洲事变的25年间的满洲的日中关系属于文化关系，于是便听了哈佛文化人类学的许多课，也由此了解到了文化人类学中有“*acculturation*”（文化变化论）这一领域。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采用了“*acculturation*”的理论模式，对满洲事变前的前史进行了阐述。

本杰明的研究成果属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杰作，我的满洲研究受其影响很大，属于以实体为考察对象的制度史研究。

○其后的中国研究

这期间，中国大陆从大跃进到文革，巨变连连。在意识形态或观念方面，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出现了显著的分化现象。其中，学术性质的中国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在研究方面，中国研究学家依旧无法前往中国，这一基本限制条件依然未能发生改变。从这一方面讲，日本和美国完全相同。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美国学者提出希望与日本学者开展学界间的合作或共同研究。这可以说是出于希望从外围或其他渠道了解中国这一庞大、不可思议的物体这一愿望吧。在实证研究方面，实情调查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只是以文献研究为主。

日美两国在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亚洲研究领域中国际合作的顶点是 1967 年 8 月密执根大学召开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我以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的助手的身份参加了该会议。其后，为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曾一度回到日本，两年后就职于日本的大学。

当时，美国各地发生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密执根国际东洋学者会议也曾特设了与越战相关的全球性自由讨论会。

为解中国和日本，美国在亚洲研究领域强化了地域研究的方法和实践活动，并将之合并为“亚洲研究”，关于越南，则被本国的战争弄得个措手不及。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希望能够承袭日本的战前中国研究成果，因此落入了日本战前中国研究的窠臼。

以费正清为首的“忧虑的亚洲研究者之会”（CCAS）的新一代学者们对前辈的亚洲学者持批判态度。

以此为契机，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了中国研究应注重“中国的内在性”的观点。费正清先生虽然对此持批判态度，但正如前文所述，我认为费正清自很早以前便从事过“中国特有的中国史”的研究。对待对自己持批判态度的年轻学者，费正清的处理颇为得体，我对他的尊敬始终未变。

○1972 年以后的中国研究

基于美国政府对即将结束的越南战争的战略考虑，美中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亦紧随其后。作为合乎逻辑的做法，日本与台湾断交。在此，姑且不论政治及外交关系，仅从学术研究方面探讨如何处理与台湾及中国的关系时，会发现台湾、中国大陆及日本之间的关系始终不甚明了。这一点令我一直感到很是遗憾。笔者既希望能够对东大的同事若林正文教授的台湾研究提供些许帮助，亦希望能够对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有所裨益。

在最近五年间，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的被称为“COE”的研究的组织化进程中，作为组织者之一，笔者参与了早稻田大学的 COE 工程——“现代亚洲学的创立工程”、人文研究机构的现代中国地域研究基地及网络的构建工程。在这些工程中，如今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被提及的最大问题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正在日渐式微。人们普遍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的中文与英语的驾驭能力较弱。

○为“国际文化论”领域的中国研究作出贡献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日本的中国研究优势在于历史研究的深厚积淀。今后应如何深入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呢？我认为，使用大量的资料，不断推进详实的实证研究固

然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更希望推出一个贯穿近代的统一解释框架。

如上所述，我提出的“国际文化论”中综合了多位前辈的观点，希望能够成为了解中国解释框架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的“国际文化论”特点有三：特点之一表现在对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考察的框架方面。尤其表现在立足于近代亚洲历史，重视接受方的文化主体性，提倡着眼于抵制与变化的考察。如果对“国际文化论”的内容特性做进一步的阐释，亦可称之为“文化触变论”，即阐释通过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引发的文化变化理论。

特点之二表现在以“文化”为构成国际文化关系主体的基本单位方面。在对被称为国民国家时代的近代国际关系进行考察时，我试着将文化——其中亦包括国民这一文化单位——视为主体单位。在人类的国际移动活动日渐兴盛，国际口岸日渐增多的今天，这一视点或许更为有效。

特点之三表现在通过以“文化”为单位，进而将整个国际社会视为多重构造的社会。中国自身便是由多重文化构成的复合型社会，亦即一个国际社会。可以认为，中国国内的各种关系及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关系都适用于“国际文化论”。

文化是各阶层相互连接的纽带，同时，也是构成某一阶层社会中人们的同一性的源泉。对中国学者乃至所有人而言，如今最大的关注点是如何定位台湾与中国大陆，如何对其进行定位，才能为每个人带来安宁与幸福，给两地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给亚洲与世界带来安定的问题。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认为“国际文化论”的观点是适用的。期待着同仁不吝赐教。

我最近参与了日中战争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从中深切地感到，无论哪个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希望能够了解庞大的中国。这一期待也同样反映在台湾、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工作定将日渐盛行起来。因此，有着共同的意愿，且能够资料共享，加之每个人的不同诠释、民族性的差别等，定将会有相应的重大成果问世。